

国际贸易视角下逆全球化研究

余森杰, 蓝锦海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世界经济遭遇严重打击,随后的欧债危机更是对欧盟造成了巨大冲击;个别国家面对国内外经济的不利形势,逐渐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将经济增速的下滑归因于贸易因素,转而开始寻求贸易保护或中断贸易协议等逆全球化措施试图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以典型的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为核心,对逆全球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虽然以往文献指出了特定情况下一国推行关税壁垒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反倾销措施对本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近期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的主要研究都指出了逆全球化措施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包括其对价格水平、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和就业等方面的负面冲击,只有少量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会对发起国经济有正面影响。研究结论和政府行为间的不自洽说明现有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产生原因和动机,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预计将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理解本轮逆全球浪潮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关键词:国际贸易;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关税壁垒;反倾销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0)04-0023-10

Study on reverse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YU Miaojie, LAN Jinhai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caused a severe blow to the world

收稿日期:2020-05-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5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ZD003)

作者简介:余森杰(1976-),男,广东饶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

economy, and the subsequent European debt crisis caused a huge blow to the EU. Faced with the unfavorable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dividual countries gradually began to doub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ree trade policies on their economies. Some even attributed the decline in economic growth to trade factors, and began to seek trade protection or interruption of trade agreements to stimulate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which are considered measures to reverse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typical Sino-US trade dispute and the Brexit incident as key example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issues related to reverse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although past literature has pointed out the rationality of a country's establishment of tariff barriers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its own economy, recent major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and the Brexit incident have indicated negative impacts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measures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global economy, including negative impacts on price levels, social welfare, economic growth, micro-enterprises and employment. Only a handful of studies believe that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and the Brexit incident 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country initiating the measures.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government action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can hardly explain the reasons and motives of the current round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However, as the follow-up research progresses, it is expected to be understood from more new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reverse globalization; trade protectionism; Sino-US trade dispute; Brexit; tariff barrier; anti-dumping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08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半个多世纪里,贸易自由化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期间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贸易壁垒大规模减少,贸易占各国经济比重逐步上升。按 Feenstra 的计算,美国货物贸易占 GDP 比重从 1960 年的 3.4% 提高至 1990 年的 8.0%,英国则从 15.3% 提高至 20.6%^[1]。除了发达国家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力推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也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并逐步向世界放开本国市场。以印度和中国为例,印度曾是全球贸易管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名义关税水平高,并有着复杂的进口许可证制度,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改革,贸易保护程度随之大幅下降^[2];中国则更早意识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在 1978 年就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战略,并在 2001 年底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自由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虽然参与国际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是绝大多数

国家经济发展的共识,但在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贸易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了新的挑战。

21 世纪初,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先后爆发,面对国内外的经济困境,原本秉持自由贸易理念的西方各国中,个别国家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更是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节点。与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本轮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更多出现在发达国家,贸易开放水平体现为从高到低的变化。本轮逆全球化浪潮对全球贸易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2020 年 WTO 公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2019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滑 0.1%,至 18.89 万亿美元,相比而言,2007 年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高达 5.5%。此外,个别国家不仅通过构建贸易壁垒进行贸易保护,还通过扰乱全球贸易规则避免国际性机构对自身的制裁。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拒绝任命新法官,有世界贸易“最高法院”之称的 WTO 上诉机构

在 2019 年底陷入停摆危机,该机构作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有权对贸易争端进行“终审”,是 WTO 协调成员国贸易冲突的重要一环。

总的来看,本轮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从国际贸易视角研究逆全球化现象显得格外相关和迫切。本文将围绕本轮逆全球化展开,分别从逆全球化出现的经济动因、逆全球化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方式、具体逆全球化事件对国际贸易以及整体经济的影响这三大角度入手,通过搜集和梳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理解本轮逆全球化进程提供一定帮助。

一、逆全球化的经济原因

针对 2008 年以来的逆全球化浪潮,众多学者分别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等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理解逆全球化的根源提供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直接反映了部分国家或人民对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不满。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主要源于世界贸易的扩散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及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3]。虽然贸易自由化为全球参与贸易开放的国家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福利,但即使是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在不同产业部门、社会群体、以及地域间的分配都是不均衡的,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国家整体福利水平上升与部分地区和人群福利水平下滑并存的矛盾。而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受损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容低估,这一经济现实在诸如“脱欧”公投等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4]。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等全球化政策带来的福利在社会中的再分配对于全球化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5]。

以制造业为例,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资本要素在全球市场上相对于劳动要素的流动性更高,传统制造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劳动要素价格更低廉的地方进行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将大

量的制造业迁往海外,留给国内的劳工工作岗位减少,引发这类群体的“逆全球化”情绪^[6]。

除了全球化进程中本就存在的福利分配不均问题外,21 世纪初的经济危机是导致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导火索。薛荣久研究了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发现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各国不断调整经贸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内容^[7]。佟家栋等认为,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是经济全球化与各国自身经济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在经济衰退期内集中爆发所引发的必然调整^[8]。Abboushi 也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长期来看利大于弊,但在经济衰退阶段,会出现短暂的贸易保护主义^[9]。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经济方面,全球化进程中福利分配不平均,导致利益受损者支持逆全球化是本轮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21 世纪初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经济问题则是推动本轮逆全球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在这两个经济原因的交互影响下,本轮逆全球化应运而生,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方式

本轮逆全球化浪潮中所使用的贸易保护方式有两类,一类是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关税壁垒,另一类是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主要手段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以上两种贸易保护方式都会被贸易保护发起国所采用,以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为例,美国在 2018 年到 2019 年间,多次分批向来自中国的特定进口品加征关税,同时,2018 年美国还对产自中国的钢铁等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最终裁定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因此,本部分将简要讨论两者作为贸易保护方式的经济合理性和实际效果。

(一) 贸易保护方式——关税壁垒

关税是目前逆全球化过程中最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其本身的执行相对简单^[10],并且福利损失

也相对数量限制要小^[11]。从一开始的低关税贸易自由论,再到最优关税理论^[12],再到较新的内生关税理论^[13],关税一直是国际贸易学者研究的重点。

虽然自由贸易理论已经推出多个世纪,但是关税依旧存在,并被各国广泛采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Bickerdike 提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单方面关税来改善贸易条件(term of trade),但代价是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贸易量减少^[14]。Broda et al. 的研究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实证支撑,其结果显示,在加入 WTO 之前,各国对本国供给弹性较低的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要比供给弹性较高的商品高 9 个百分点。同时,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拥有更高市场势力的商品种类上,美国对其贸易限制措施就更少^[15]。

Bickerdike 虽然为关税的持续存在和实现自由贸易的困难提供了重要理论解释,但是没有具体分析被制裁国选择关税报复后的关税发起国福利变化情况。Johnson 在其研究中开创性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垄断地位足够大,即使它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关税报复,但它仍将“赢得”一场双边“关税战”^[12]。随后的研究中,Kennan et al. 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纯交换模型,验证并支持了发起国的相对经济规模大小在关税壁垒“胜负”中的重要性^[16]。Syropoulos 则构建了一个以国家规模为中心的新古典贸易模型,表明一个国家偏向于非合作的纳什关税均衡(报复)而不是选择自由贸易的充分条件是其相对规模足够大^[17]。Opp 指出如果从比较优势中获得的专业化收益很高,并且运输成本很低,那么两个国家都会选择比较高的进口关税,同时,一个足够大的经济体由于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更倾向于征收关税的纳什均衡而非自由贸易,同时发起国相对经济规模的阈值大小随着比较优势的上升而上升,而随着运输成本的升高而降低^[18]。

除了相对经济规模外,许多研究还分析了其他影响关税战的因素。Burbidge et al. 从政府运行成本出发,构建了针对关税战和贸易协定的简单模型,结果显示“昂贵”的政府会导致较低的非合作关税,较“低廉”的政府则更可能赢得关税战^[19]。

McLaren 研究指出,如果在一个大国和小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需要进行不可逆转的出口部门投资,而该投资将可能会导致小国后期过分依赖于与大国的贸易,并破坏其之后的议价能力,因此,小国可能会更偏向于进行关税保护,而不是贸易合作^[20]。

一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征收关税以及关税水平时,通常考虑的是关税政策对本国经济的促进或保护作用。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数据显示,高关税会损害一国的经济增长,随着各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各类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解除,都促进了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Brock et al. 在文章中构建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特定要素动态模型,研究了差别关税对本国市场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文章强调了保护性贸易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跨期扭曲,即关税保护在短期内能产生收益,但在长期中会提高福利成本^[21]。

针对关税和经济增长间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引出“关税-增长”悖论(tariff-growth paradox),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关税保护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正相关,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者关系逆转,关税保护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此消彼长。Clemens et al. 提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对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但是对同时期相对落后国家来说,高关税并没有伴随着经济增长。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发展的研究发现,1950 年之后,一国关税上涨虽然会损害经济增长,但在贸易伙伴的关税水平很高、贸易伙伴的增长更加缓慢、全球交通联系并不紧密的情况下,高关税并不会损害经济增长^[22]。进一步研究中,Jacks 则研究了贸易流量数据,结果显示在非互惠贸易环境中,关税可能会起到促进贸易增长的作用^[23]。总之,在一国遭遇到关税制裁时,进行关税报复对经济的增长可能不是负向,甚至可能出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一论点为关税壁垒中的目标国家进行关税报复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贸易保护方式——反倾销措施

在众多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措施一直是

各国针对特定商品和特定厂商进行贸易制裁的主要手段,在本轮逆全球化浪潮中,反倾销是除了关税以外最主要的贸易保护手段,美国和中国都曾在贸易摩擦期间启动对对方的反倾销调查。针对反倾销的研究主要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探究倾销行为和反倾销行为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是探究反倾销措施的实际效果。

Brander et al. 在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解释倾销行为的“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并指出一国的寡头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选择以低于本国市场的商品价格向外国市场倾销商品,虽然寡头厂商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但是按照“薄利多销”的逻辑增加了自己的总利润,同时,别的国家的厂商也会选择相同的策略进行倾销,最终导致国际贸易中的相互倾销行为^[24]。

通常来说,当一国受到进口国的商品倾销时,为了保护本国对应行业的发展,会对倾销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反倾销税。Kolev et al. 在研究中发现,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因为其需要通过政府代理机构进行倾销和损害的衡量,但由于政府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难以衡量不同企业的不同生产成本结构,最终导致政府所拥有的自由裁决权使得倾销行为通常都被判定存在^[25]。Prusa et al. 研究了各国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动机,并通过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发现战略动机可以很好地解释近年来新增的反倾销案例,这意味着传统理论中“不公平交易”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解释新增的反倾销措施^[26]。

在反倾销措施的实际效果方面,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发起国和目的国的经济影响。对发起国的研究中,Konings et al. 使用了欧盟 1993 ~ 2003 年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受到反倾销措施保护的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生产率的提高有限,还不能弥补从未参与过反倾销案件的企业的生产率差距;同时,考虑到被保护企业的异质性,初始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落后企业)在保护期间生产率会提高,而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前沿企业)在保护期间会遭受生产率下降的损失^[27]。Pierce 基于包含全美制造业厂商的数

据库,研究了美国征收反倾销税对本国制造业企业绩效和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反倾销保护和企业受益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因为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本国企业收益增加;相反,反倾销行为导致本国低生产率企业受到保护,减慢了资源向更高生产率企业流动的速度^[28]。

对目的国企业的研究中,Chandra et al. 利用中国企业级数据库,研究了美国反倾销税对中国企业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导致中国的目标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12%,出口占比更高的企业在美国的反制措施下,出现了更大幅度的生产率下降,并且结果显示产量下滑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可能是企业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29]。Bown et al. 通过构建模型发现,一国实施反倾销等措施会使世界贸易流动受到严重扭曲;利用美国对日本在 1992 ~ 2001 年间的多次贸易限制措施研究发现,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导致日本对包括欧盟在内的第三方市场出口增加了 5% ~ 7%^[30]。朱晶等的研究也发现了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制裁下出现了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31]。Brambilla et al. 则以美国对越南的鲶鱼进行反倾销制裁为例研究了反倾销税对目的国居民的影响,结果显示反倾销税显著减少了越南出口美国的鲶鱼数量,并且显著抑制了鲶鱼渔民的收入增长^[32]。

三、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在对逆全球化的经济动因以及相关贸易保护方式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进一步以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为典型案例,研究本轮逆全球化对具体参与国的国际贸易影响,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各国都偏向于支持贸易开放,相对应的自由贸易也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增长,不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此期间个别国家间曾出现过一些贸易争端以及随后的贸易保护措施,但全球化的进程依旧在稳步推进。但是 2018 年美国率先挑起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全球

化的历史车轮遭遇了其在 21 世纪以来最大的阻碍,以致于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态势。

虽然美国经济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历任美国总统几乎都曾推出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如 1977 年,卡特总统对鞋类产品进口实行配额限制;1981 年,里根总统向日本政府施压,最终迫使日本政府实施“自愿出口限额”(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协议,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受阻;2009 年,奥巴马总统向中国轮胎征收 35% 的关税。回顾此前的贸易保护措施,我们会发现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关税战”,不论是涉及的规模还是种类,都远超此前的贸易争端。相对应地,本轮贸易摩擦引发了全球经济震动,许多经济学者深入研究中美贸易摩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

随着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遭遇巨大打击,面临国内经济窘境,美国社会逐渐响起了通过关税等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声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015 年竞选时就承诺执政后会对个别国家进行贸易制裁,此时一系列文献就开始从理论上研究若贸易摩擦爆发的话,会对国家造成的福利损失或增长。Ossa 构建了一个包含传统贸易和政治经济动机的模型,结果显示贸易摩擦中最优关税平均为 62.0%,国际贸易政策合作中断带来的政府福利损失平均为 2.9%,未来多边贸易谈判可能带来的政府福利收益平均为 0.5%^[33]。Niu et al. 利用多国多部门的 EK 模型来预测美国征收 45% 的关税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文章分别评估了美国单方面进行关税制裁和中国进行关税报复的情况,模型拟合结果都显示飙升的进口关税会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崩溃,美国会遭受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中国可能出现部分损失甚至轻微的获利。此外,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小型开放经济体可能会从贸易摩擦中少量获利,但大多数国家会受到附带损害^[34]。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证研究

美国是本轮贸易摩擦的发起国,2018 年贸易摩

擦正式爆发后,研究其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成为了本轮研究的一大重点。征收进口关税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会导致对应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Amiti et al. 利用传统贸易模型研究了 2018 年贸易摩擦对美国价格水平和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关税的征收几乎完全传导至当年美国的国内价格,导致目前关税提高的负面影响全部落在了美国国内消费者和进口商的身上;文章的测算结果显示,2018 年美国提高关税造成了 82 亿美元的无谓损失,同时还造成了 140 亿美元的转移支付,即政府征收关税从消费者手上夺取的收益^[35]。

Fajgelbaum et al. 也分析了本轮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短期影响,结论同样是关税所针对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并未下降,这意味着关税已完全转嫁至含税价格,对美国消费者和购买进口产品的公司造成的损失为 510 亿美元。该文章将估计的贸易弹性嵌入到美国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结果显示,计入关税收入和对国内生产者的收益后,实际总收入损失为 72 亿美元;同时,进口关税更偏向于保护政治竞争能力更强的地区,模型同时指出报复性关税对主要支持共和党的地区贸易部门工人的负面影响最大^[36]。

Cavallo et al. 利用更加微观的零售商数据研究 2018 年贸易摩擦对进口商、消费者和出口商的影响,结果显示加征关税导致的价格上升基本上都转嫁在进口商支付的总价格中,意味着关税负担大多落在美国自身;其次,利用大型零售商的产品级数据分析后,结果显示关税对零售价格的影响比较复杂,虽然受影响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受影响产品和不受影响产品间的差异很小,这表明零售商的零售利润率在下降;此外,美国出口商方面的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商降低了受到外国报复性关税的商品的价格^[37]。

Flaen et al. 则具体研究了洗衣机的价格变化和贸易限制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由于 2018 年对几乎所有货源国征收洗衣机进口关税,洗衣机的价格上涨了近 12%,相比于 2016 年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占美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导致的洗衣机价格小幅波

动,本轮美国贸易摩擦的价格反应更加剧烈^[38]。除了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外,Amiti et al. 还提出关税壁垒导致的美国商品品种减少、跨国公司被迫重新部署全球供应链都会导致额外的福利损失^[35]。

贸易摩擦除了影响社会福利外,还带着明显的分配效应。Waugh 使用美国县级新车销售范围的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消费增长对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弹性约为-1。相应地,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影响最严重的四分之一地区的消费增长下滑了3.8%,同时还导致了贸易部门和零售部门的就业下滑,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报复行为导致美国的福利损失相对集中,某些地区的损失很高^[39]。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除了被广泛使用的关税手段外,中美还使用了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来进行贸易制裁。Li et al. 利用多国全球一般均衡(GE)模型来模拟可能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并将带有贸易成本的内生贸易不平衡结构引入模型,结果显示美国可以根据对中国的单方面制裁措施获利,但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出现损失;对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会在一定程度损害中国经济。同时,引入非关税壁垒贸易摩擦将加剧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可能要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40]。

四、英国“脱欧”研究

在2008年以来的逆全球化浪潮中,除了中美贸易摩擦外,英国“脱欧”(Brexit)无疑是本轮逆全球化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2016年6月23日,尽管英国大多数机构都支持留在欧盟,但52%的选民公投决定“脱欧”,随后英国政府便开始了一系列“脱欧”工作,由于各方势力对“脱欧”协议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直到2020年1月,英国国会才正式通过“脱欧”协议,并在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回顾历史,英国在1973年加入了欧共体(欧盟前身),随后成为欧盟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但随着2011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外经济压力倍

增,英国民众呼吁“脱欧”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在英国举行公投之前,社会普遍认为英国“脱欧”概率不大,但最终公投出现了始料未及的结果,震惊了世界并拉开了英国将近4年的“脱欧”进程的帷幕。

英国“脱欧”作为近年来轰动世界的重大经济事件,引发了许多学者对英国“脱欧”的经济学研究。由于英国“脱欧”过程漫长,期间许多研究都立足于预测英国“脱欧”后对英国、欧盟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John 研究显示英国“脱欧”会导致英国和欧盟的贸易成本上升,导致较低的贸易和外国投资,并最终导致英国的平均收入下降。通过标准的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英国“脱欧”导致英国的福利损失约为1.3%至2.6%,若是考虑生产率变化的动态影响,这些损失可能会上升至6.3%至9.5%,而民众投票时所认定的“脱欧”好处(减少移民、改善法规和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协定增加等)很难抵消这些损失^[41]。Sampson 的研究也发现英国“脱欧”将使英国变得比以前更穷,因为这将导致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移民新壁垒,且英国“脱欧”成本的合理估计范围为英国人均收入的1%至10%^[42]。虽然英国直到2020年初才正式完成“脱欧”,但在公投结束后的短短几年内,英国经济已经受到了“脱欧”事件的冲击。

英国“脱欧”不仅造成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损失,还给英国甚至全球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Davies et al. 利用股票收益的数据,构建了一个两阶段评估框架,研究英国“脱欧”对公司市场回报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大多数公司在公投结果公布后都获得了负回报,但市场对不同企业的反应存在异质性。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更多暴露于英国和欧盟的公司股票表现更差,同时结果显示依赖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回报率表现也更差^[43]。Bloom et al. 使用一项针对英国公司进行的调查数据,得到了英国“脱欧”的3个关键结果:首先,英国退出欧盟的决定导致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幅和持久的增加;其次,英国“脱欧”的预期导致投资逐渐减少约11%;最后,研究估计,公投后的3年内,英国“脱欧”进程将使英国的生产率下降了2%至5%。研究结果还

表明,生产能力强并且全球化程度高的企业会比生产率较低的国内企业受到更多负面冲击^[44]。

虽然许多经济学者认为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有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有利。Minford 提出利用 CEG 模型来测算英国“脱欧”的贸易影响,因为传统的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测算模型中,针对欧盟与英国形成贸易壁垒和边界的假设基本上很难成立。最终 CEG 模型测算的结果显示,如果考虑英国“脱欧”后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英国法规的完善、对非熟练移民的限制等,英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 15 年内每年多增长 0.5%^[45]。

五、结论与展望

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传统理论中支持自由贸易的理论和研究遭到了新的挑战。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一大批文献指出关税战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当非关税贸易壁垒对本国经济的必要性,但整体理论还是偏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愈演愈烈,作为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两个典型案例,从事件发生伊始就吸引了经济学界的热烈关注,并带动了一系列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对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事件对经济的影响持消极态度,因为大打关税战和退出关税同盟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传统理论中的分析结论。虽然现在许多研究文献都具体预测和分析了这两个逆全球化事件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包括对价格水平、社会福利、经济增长、微观企业和就业等方面的研究。但是现有文献依旧没有构建出一个相对普遍适用的分析逆全球化的理论框架,无法很好解释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的理论原因和动机。

总的来看,由于英国“脱欧”在 2020 年初才正式实现,中美双方也在 2020 年初才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因此针对这两个事件的研究都还在进行中,研究还没有非常充分,随着后续事件的推进,以

及相应文章的发布,我们预计会对本轮逆全球化浪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经济认识。

六、结语

逆全球化的浪潮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中达到了一轮高潮,全世界都为此而侧目,不仅仅是因为其涉及两个世界大国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因为本轮逆全球化对传统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造成了一次剧烈冲击,挑战了大众对国际贸易的传统认识。在一系列研究和测算结果的背后,我们急需理解逆全球化爆发的真正根源和理论逻辑。

随着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演化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预计将对各国经济和国际交流造成深刻打击,甚至会引发新一轮“被动型”逆全球化。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进行,以及英国“脱欧”效果的逐步显现,这类“主动型”逆全球化的研究也将持续产出研究成果。逆全球化浪潮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不可避免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 [1] Feenstra R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4): 31-50.
- [2] Topalova P, Khandelwal 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ndia[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 995-1009.
- [3] Khor M, Khor K P.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policy choices[M]. London:Zed Books, 2001.
- [4] Colantone I, Stanig P.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8, 112(2): 201-218.
- [5] Davi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 [6] 佟家栋,谢丹阳,包群,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J]. 中国工业经济,2017(6):5-59.
- [7] 薛荣久. 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

- 遏制[J]. 国际贸易, 2009(3): 28-31.
- [8] 佟家栋, 刘程. 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调整期[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131-138.
- [9] Abboushi S. Trade protectionism: reasons and outcomes [J]. Competitiveness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2010, 20(5): 384-394.
- [10] Baldwin R E. Measuring nontariff trade policies [EB/OL]. (1989-05-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978.pdf>.
- [11] Goulder L H, Eichengreen B.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general equilibrium: intertemporal and inter-industry effects [EB/OL]. (1989-05-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965.pdf>.
- [12] Johnson H G. 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3, 21(2): 142-153.
- [13] Mayer W. Endogenous tariff form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5): 970-985.
- [14] Bickerdike C F. Review of A. C. Pigou's protective and preferential import dutie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07, 17(65): 98-102.
- [15] Broda C, Limao N, Weinstein D E. Optimal tariffs and market power: the evid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5): 2032-2065.
- [16] Kennan J, Riezman R. Do big countries win tariff war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8, 29(1): 81-85.
- [17] Syropoulos C. 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revisited: how country size matter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3): 707-727.
- [18] Opp M M. Tariff wars in the Ricardian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good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0(2): 212-225.
- [19] Burbidge J, Myers G. Tariff wars and trade deals with costly government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12(3): 543-549.
- [20] McLaren J. Size, sunk costs, and Judge Bowker's objection to free trade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3): 400-420.
- [21] Brock P L, Turnovsky S J. The growth and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ial tariff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3, 34(4): 765-794.
- [22] Clemens M A, Williamson J G. Why did the tariff-growth correlation change after 1950?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4, 9(1): 5-46.
- [23] Jacks D S. New results on the tariff-growth paradox [J].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2006, 10(2): 205-230.
- [24] Brander J, Krugman P.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3, 15(3/4): 313-321.
- [25] Kolev D R, Prusa T J. Dumping and double crossing: the (in) effectiveness of cost-based trade policy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3): 895-918.
- [26] Prusa T J, Skeath S.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motives for antidumping filings [EB/OL]. (2002-01-14) [2020-05-20]. <http://academics.wellesley.edu/Economics/skeath/research/ADTrends.pdf>.
- [27] Konings J, Vandenbussche H.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firms to trade protec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76(2): 371-383.
- [28] Pierce J R. Plant-level responses to antidumping duties: evidence from U. S. manufactur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2): 222-233.
- [29] Chandra P, Long C. Anti-dumping du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exporters: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51: 169-186.
- [30] Bown C P, Crowley M A. Trade deflection and trade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2(1): 176-201.
- [31] 朱晶, 胡俊. 美国对华农产品反倾销贸易救济效果分析——基于第三国市场的视角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1(10): 81-88.
- [32] Brambilla I, Porto G, Tarozzi A. Adjusting to trade-policy changes in export markets: evidence from U. S. antidumping duties on Vietnamese catfish [EB/OL]. (2009-07-01) [2020-05-20]. <https://core.ac.uk/reader/62832622009>.
- [33] Ossa R.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with dat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2): 4104-4146.
- [34] Niu P H, Zhou Z R, Lin Z S, et al. Measurement-device-independent quantum communication without encryption

- [J]. Science Bulletin, 2018, 63(20): 1345-1350.
- [35] Amiti M, Redding S J,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ariffs on prices and welfa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 33(4): 187-210.
- [36]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et al.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1): 1-55.
- [37] Cavallo A, Gopinath G, Neiman B, et al.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 [EB/OL]. (2019-10-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396.pdf>.
- [38] Flaaen A B, Hortacsu A, Tintelnot F. The production relocation and price effects of U.S. trade policy: the case of washing machines [EB/OL]. (2019-04-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5767.pdf>.
- [39] Waugh M E. 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trade shocks: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EB/OL]. (2019-10-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353.pdf?sy=353>.
- [40] Li C, He C, Lin C.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possible China-US trade war [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8, 54(7): 1557-1577.
- [41] John V R. Brexit's long-run effects on the UK economy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6, 47: 367-383.
- [42] Sampson T. Brexit: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4): 163-84.
- [43] Davies R B, Studnicka Z.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Brexit: early indications from the FTSE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10: 1-17.
- [44] Bloom N, Bunn P, Chen S, et al.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UK firms [EB/OL]. (2019-09-01) [2020-05-20].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218.pdf>.
- [45] Minford P. The effects of Brexit on the UK economy [J].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1): 57-67.